

RENXIN



人心

——人的善惡天性



「美」埃里希·弗洛姆 著
范瑞平 牟斌 孙春晨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人 心

• 人的善恶天性 •

〔美〕埃里希·弗洛姆 著
范瑞平 牟斌 孙春晨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年·福州

Erich Fromm

THE HEART OF MAN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

Harper Colophon Book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本书根据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4年版译出

人 心

人的善恶天性·

〔美〕埃里希·弗洛姆 著

范瑞平 牟 斌 孙春晨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375印张 108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600

ISBN 7-211-00409-6

B·13 定价：1.5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先后在海德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22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也在慕尼黑和柏林受过精神分析训练。30年代迁居美国,先后在许多著名大学执教。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自为的人》、《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弗洛伊德的使命》、《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爱的艺术》等。

这里译出的《人心》一书,亦是弗洛姆的代表作。它与《爱的艺术》一起构成相互补充的对应本。《爱的艺术》主要探讨了人的爱潜能,《人心》则主要论述了人的恶潜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心》一书基本上表述了弗洛姆关于人性的独特见解。

弗洛姆的人性理论的出发点是反对把人界定为一种特定的实体,一种单一和同质的存在。在西方传统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中,人基本上被定义为恶的、堕落的,或者善的、可完善的。弗洛姆认为,这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因为善与恶是一种实体性的概念,在这种人性论的阐释下,人的本性就是永恒不变的。在他看来,人被定义为善,人便成为在理想的幻灭

中度其一生的人；人被定义为恶，人便成为玩世不恭的人。同时，他也反对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能够允诺的动物”（尼采），以及诸如从社会学、生物学、生理学角度对人的界说。他认为，这些人性论只表述了人的某些属性，而没有涉及人的本质。

那么，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弗洛姆认为，所谓的人性或人的本质是具体地植根于人存在中的固有矛盾。因为人性不是一种实体，一种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实际上，人的本质是人主动选择、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

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与动物又有根本的区别，人有理性和自我意识。一方面，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使人超越自然和动物，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又破坏了动物生存所特有的和谐，人失去了固有的平衡，从而进入一种变动不定、陌生的状态。人的生命意识到自身，便意识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生不由己，死不由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自然分离的、无依靠的存在。因此，人就处于孤独、痛苦和恐惧之中。自然，人不堪忍受这种牢狱般的生活，人竭力要从分离的痛苦和孤独中解脱，寻找失去的和谐。这就构成人生存的固有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引起和产生人的各种心理品质和心理潜能。人的本质就存在于解决或解脱这种固有的矛盾之中，因而也就表现出人趋向于善或恶的定向。这两种定向具体表现为下面将要简述的人的各种潜能。

首先，人具有各种形式的暴力定向。弗洛姆认为，暴力可分为非病理性暴力和病理性暴力两大类。非病理性暴力是有助于生活的正常的暴力形式，它包括游戏性暴力和反应性暴力，前者的目的在于寻求表现技能（如体育运动中的击

剑、比武等)；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受到威胁时，保卫生命、自由、尊严和财产(如自卫)。病理性暴力包括报复性暴力、补偿性暴力和原始的“嗜血渴望”。报复性暴力的目的是阻止别人对自己的进一步伤害，因而其病理程度较轻。而补偿性暴力和原始的“嗜血渴望”则是病理程度严重的暴力形式；前者表明生活的残缺和空虚，并通过破坏生活来超越生活(如虐待)；后者则有一种杀人的激情，并以杀人的方式来超越生活，在动物水平上肯定生活。

其次，人具有爱死和爱生的定向。爱死表示一种伤感的情绪，杀人的愿望，对暴力的崇拜，对死尸和虐待的兴趣。爱死的人憎恨生活，希望回到无知和动物的原始生活中去，并把人的价值视为物的价值。爱生则表示生存的整体定向和完整方式，它的目的是保持生命，欣赏生命和生命的所有表现。爱生的人是健全的人，对他来说，欢乐是德性，人生的目的是献身于所有富有生气的东西。

再次，人具有自恋定向。自恋是一种比性欲和求生欲更为强烈的情绪，其特点是对外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以自己的人格代替现实，因而自己是“神和世界”。自恋可分为良性自恋、病理性自恋和恶性自恋三种。良性自恋使人专注于自己的活动和成就，因而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即保护自己，从事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活动；病理性自恋与理性和爱相冲突，使人不能正确评价事物和他人，因而限制和歪曲理性判断；恶性自恋则使人成为虚伪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使人的行动相悖于群体的生存原则。

最后，人具有乱伦固恋定向。他认为，对母亲的固恋不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恋母情结”，只表示男孩对母亲的性乱伦渴求。在他看来，男孩和女孩对母亲都具有乱伦联

系，但这种联系不是性本能的联系。乱伦固恋包含渴望母亲的爱、保护和对母亲的恐惧，从而导致人缺乏独立、自由和责任。良性的母亲固恋只表现为需要母亲似人物的安慰、爱恋、称赞、供养和照顾。恶性的母亲固恋则是乱伦共生，它表现为希望永远象婴儿那样被爱，有一种返回子宫的欲望，从而不仅导致曲解理性，不能客观评价自己与他人，而且还失去人的全部独立性和完整性。

弗洛姆认为，如果爱死、恶性自恋和乱伦共生集结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具有衰败综合征，就会构成最危险和最恶毒的人格定向。如果与此相对应的爱生、爱和独立性集结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具有成长综合征，这是一种生产性的或创造性的人格定向。

总而言之，以上这些相反的心理定向潜在地存在于人身上。人在解决自身固有矛盾的过程中，这些潜能就会表现出来。在弗洛姆看来，人可以通过回归和发展这两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存矛盾。回归的方式表示人为了了解脱分离和孤独，而竭力返回到动物和自然的生活中去，抛弃使他成为人，却又折磨着他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与自然达到原始的和谐。发展的方式表示人通过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人道性的全面发展，以超越自然，解除分离和孤独，达到一种新的和谐。由衰败综合征支配的人必然以原始的回归方式来解决人固有的矛盾，因而表现为恶；由成长综合征统制的人则必然以发展的方式来解决人固有的矛盾，因而表现为善。

实际上，弗洛姆想说明的是，人自身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潜在定向，这些潜能具体地在历史中显现、展开，既可表现为原始的回归，又可表现为发展。对人来说，这两种潜在性都是真实的可能性，因此，人在这种真实的可能性中有选择

的自由，人成为善人或恶人，全凭自己自由决定。人并不是天生就恶，冷酷无情的人在刚开始生活时，都有成为善人的可能，只是人在自由作出决定时，由于不断作出错误的决定，他的心便变得愈来愈冷酷无情和恶。反之，如果一个人不断作出正确的决定，他的心就会变得愈来愈温和、活泼，变得爱和善。因此，人根本没有善恶的先天属性，人的本质最终由自由选择这一点所决定。他认为，人的善在于不断地改造、进取和发展，在于使人的存在不断接近完全的人道性。恶是人在逃避他的人道重负的悲剧企图中去失去自己；最大的恶是反对生活、爱死和乱伦共生，其次是缺乏爱、缺乏理性、缺乏兴趣、缺乏勇气。

弗洛姆是一个爱憎分明、具有坚定信念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看来，尽管人可以以回归的方式来解决人生存的固有矛盾，但人终归是人，人不能成为动物，亦不能成为上帝，非人道的和冷酷无情的心依然是人心。因此，人不能只满足于以恶来解决生存矛盾。人要解除分离、孤独和恐惧，就必须全面而充分地发展他的人道性，以创造性的生活来达到、实现新的统一与和谐。人的自由并不在于选择恶，选择回归的解决方式，在他看来，“自由仅仅是遵循理性的、健康的、幸福的、良心的呼声，以反对非理性激情呼声的能力。”倘若没有爱，没有独立性，整个人类的生活就行将毁灭。

以上便是弗洛姆《人心》一书的基本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弗洛姆基本上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弗洛伊德本人一样，也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人，用心理分析方法解决人性问题。但是，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也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特别是反对他的泛性欲主义，驳斥他关于性本能在个性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在本书中，有几个

关键性的精神分析概念与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无甚联系，例如自恋概念。在他看来，自恋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的被动情绪，在人身上，他比性本能更为强烈。就对母亲的乱伦固恋来说，弗洛姆认为，它不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恋母情结”，一种儿子对母亲的性的乱伦渴求，而是儿子和女儿对母亲的心理依赖感和心理恐惧感。在人格或个性的发展中，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的决定作用，弗洛姆则强调人在两种相反的真实可能性中的选择，强调个人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人格或个性，强调人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奋斗的进取精神。因此，人的生物本能在弗洛姆的思想中被降低到了次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他更推崇马克思，并承认，与弗洛伊德相比，马克思是一个更加渊博和更加深刻的思想家，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弗洛伊德主义。

毋庸置疑，弗洛姆的人性理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现代科学技术破坏了人性的完整性。人所建立的庞大的社会机器耸立在人之上，人不仅不是社会的创造者，反而只是社会的奴隶，人变成了物，机器的齿轮。在这种境遇中，人感到自己渺小无能，感到烦恼、孤独、迷茫、恐惧、孤独和忧虑成了当代人的主导情绪。因此，他对现代人的命运和困境感到深深的忧虑，对人的生存和前景给予深切的关注，并致力于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全面发展。他的乌托邦式的人道主义理想，强调人没有先天永恒不变的本质，强调人的主动选择、不懈努力、顽强奋斗、创造性生活……这一切都表明，弗洛姆的人性理论既有某些独到的见解，又有许多合理的因素。无怪乎此书一出版，立即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不仅感到诸如核战

争这样的破坏力量的威胁，而且还恐惧于人自身潜在的毁灭自己的能力。A. 坎伯兰 (Abraham Kaplan) 在《纽约书评》上撰文指出：弗洛姆《人心》的主题之一是，“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人类无论如何都肯定处在危机的转折点上。”因此，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人必须清醒认识自己的恶潜能，并主动作出善的选择，复兴人道主义传统，使人发展为全面人道性的人。否则，人类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弗洛姆的人性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他虽然推崇马克思甚于弗洛伊德，但他在不少地方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是片面的。比如他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人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在人的活动中，还有一种非理性的无意识力量在起作用，并企图以心理为本位的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加以鉴别。在弗洛姆看来，所有的人都具有共同的本性，这种共同的本性是由相同的人类境遇而形成的人的心理定向。虽然他反对与生俱来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但在他的理论中，实际上也假定了某些永恒不变的人性（也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人具有爱的能力、追求自由和独立性的能力，以及恶的破坏的能力。由于他企图建立一种以心理为本位的人性论，所以，不能看到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地位对人的决定性作用，不能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他的人性理论中，社会条件只影响和改变人心理定向的表现方式或形态，似乎在任何文化类型里，人自身都携带着所有的心理潜能，既可以成为象野兽那样残忍的人，又可以成为具有理性和爱的人。人性的差异仅仅在于，在同一社会里，有的人表现出原始的回归，有的人表现出创造性的

发展，人的哪一种心理定向表现出来，则取决于他具体的生活环境和他自己的主动选择。这样，他便把人的社会性降低到第二位，社会生活条件的作用只不过是人性实现的条件而已，从而最终把人的心理定向看作为不受社会制约，不依赖于社会存在的独立因素。

另外，弗洛姆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是心理上的区别。心理的突变使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从而才构成人生存的固有矛盾，形成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否定了劳动对人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社会存在对人的理性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弗洛姆的人性论依然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其方法论基础的人性论，虽然新颖、耐人寻味、富于启发性，但最终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因而不能科学说明人的本质的问题。至于弗洛姆天真地希望通过人的心理革命，通过改变个人心理的价值定向，进而健全和改造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

由于弗洛姆的人性论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所以，他不能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人心》这本书中，他不区分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同视为具有衰败综合征的人，确实是一种片面的、偏颇的观点。我们在翻译中对这些地方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本书的翻译分工大致如下：范瑞平译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孙春展译第四章、第五章，牟斌译第六章。牟斌校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范瑞平校第四章和第六章，

孙春晨校第三章。译文中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7年7月于北京

前 言

本书吸取了我在以前的某些著作中论述过的一些思想，并力求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发挥。在《逃避自由》中，我论述了自由问题、虐待狂、受虐狂和破坏性；与此同时，通过临床经验和理性思辨，我以为，我对自由以及各种类型的攻击和破坏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我已经能够把攻击的各种类型同破坏和恋尸的那种恶性形式区别开来，攻击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有助于生活，而恋尸则是对死亡的一种真实的爱，它与恋生相反，因为恋生是对生活的喜爱。在《自为的人》中，我以我们对于人的本性的了解为基础，而不是以宗教启示或人为的法律和约定为基础，讨论了伦理规范问题。在本书中，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讨论恶的本性和善恶选择的本性。最后还须说明，本书在有些方面是《爱的艺术》的一个补充，尽管《爱的艺术》的主要论题是人的爱的才能，而这里的主要论题则是人的破坏才能、人的自恋和乱伦固恋，不过，虽然在本书中讨论非爱的内容占据了很多篇幅，但尚且在一种新的、更宽广的意义上即爱生的意义上，探讨了爱的问题。我试图表明，由爱生、独立和克服自恋所构成的“成长综合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由爱死、乱伦共生和恶性自恋形成的“衰败综合征”。

我已经趋向不仅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在过去这些

年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从事这种衰败综合征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变得日益紧迫起来，那就是，尽管人们具有善良意志并且了解核战争的后果，但为什么避免战争的尝试同战争之可能和威胁之巨大（如果核军备竞赛及冷战继续进行的话）相比简直微乎其微呢？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促使我去研究机械化程度不断增强的工业社会中漠视生命的现象：在这种社会中，人被转化为物品，结果，人充满着对生活的忧虑、漠视，甚至憎恨。但是除此之外，当今的暴力特征是以行刺肯尼迪总统以及青少年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能是有所变化的第一步，需要得到解释和理解。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正被引向一个新的野蛮状态——即使没有核战争的爆发；或者我们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兴是否可能？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本书还有一个目的乃是澄清我为一些精神分析观念同弗洛伊德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满足于被划属于精神分析的一种新“学派”，不管这种学派被称为“文化学派”还是“新弗洛伊德主义”。我相信，许多新学派，在他们发展有价值的见解的同时，也已经丢掉了弗洛伊德很多最有意义的发现。我当然不是“正统的弗洛伊德派”。事实上，任何在60年内没有发生变化的理论，本身就不再是同始祖的初始理论相同的东西；它是一种僵化的重复，由于是一种重复，实际上就是一种变形。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是在一种特定的哲学参照系中构想出来的，这种参照系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它在本世纪初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十分流行。我认为，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需要一种不同的哲学参照系，即辩证人道主义。我在本书中力图表明，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诸如恋母情结、自恋和死的本能，都受到了他的哲学前提的束缚，一旦摆脱掉它们，弗洛

伊德的发现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和更有意义。^①我相信，正是人道主义这种参照系，以及人道主义同毫不留情的批判精神、毫不妥协的实在论及合乎理性的信念之间的奇妙结合，将会使得由弗洛伊德奠定基础的这项工作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尽管本书所表达的全部思想是我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社会进程的研究者）的临床工作的结果，但我略去了大量的临床文献。我计划在一部较大的著作中提供那些文献，我将在那部著作中论述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治疗。

最后，我要对保罗·爱德华表示感谢，他对于论述自由、决定论和选择论的那一章提供了批评建议。

埃里希·弗洛姆

① 我要强调指出，对精神分析的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要用现在知名的“存在主义分析”来取代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替代常常是简单肤浅的，人们引用一些人从海德格尔或萨特（或胡塞尔）那里得来的词句，却没有把它们同重要的、深层的临床事实联系起来。萨特的心理学思想虽然显赫一时，却失之肤浅粗略，缺乏可靠的临床基础。某些“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是如此。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一样，并不是一个新的开端，而是一个结果；它们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后西方人的绝望的表现。不仅如此，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唯我主义的表现。我们只要论及诸如同情纳粹主义的海德格尔那样一个哲学家，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萨特更不可信，他自称代表马克思的思想，并且是未来的哲学家，却又是他所批判并要改变的那种混乱和自私的社会精神的一个典型。至于说到任何生活意义都不是由上帝给定并加以保证的这种信念，许多学说都持有这种见解，在宗教学说中，尤以佛教为著。然而，就萨特及其追随者们认为不存在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的价值标准这种主张和萨特的那种等同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任意武断的自由概念而言，萨特及其追随者们不仅丧失了人道主义传统的最重要成就，而且丧失了有神论宗教和无神论宗教的最重要成就。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言	(1)
1 . 人——是狼还是羊?	(1)
2 . 不同的暴力形式	(8)
3 . 爱死与爱生	(22)
4 . 个体自恋与社会自恋	(50)
5 . 乱伦图结	(84)
6 . 自由、决定论、选择论	(105)
索引	(145)

1. 人——是狼还是羊？

有许多人认为人是羊，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人是狼。双方都能为自己的见解找出合适的论据。认为人是羊的那些人会指出这样的事实：人们容易受影响去做那些命令他们去做的事情，即使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有害处；他们追随他们的领袖进入战争，而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毁灭；他们相信各种胡说八道，只要那些话伴有足够的法律效力并受到权力的支持——不管是牧师或国王的严厉威胁，还是隐藏的或并不隐藏的劝说家们的温和话语。大多数人似乎都是易受暗示的半清醒的孩童，情愿使自己的意志屈服于任何以足够威胁或足够甜蜜的话语来支配他们的人。的确，深信自己能够十分有力地抵住大众的异议的人是常规的例外，这种人常常要在几个世纪以后才受到称赞，而多半要被其同代人嘲笑。

正是基于人是羊这一假定，宗教裁判官们^①和独裁者们建立了他们的制度。不仅如此，正是由于人是羊因此需要领袖来为他们做决策这种信念，经常使得领袖们真诚地确信，如果他们是领袖，为人减除了责任和自由的累赘，如果他们给人以人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们就是在履行一项道德义务——哪怕是一项悲剧性的义务。

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羊的话，那么为什么人的生活

^① 指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译者注